

陈望道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望道文集

第一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郭绍虞
封面装帧 范一辛

陈望道文集

第一卷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25 插页 4 字数 406,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书号 3074·519 定价 1.70元



陈望道同志



五四时期的陈望道同志(摄于一九二〇年)



陈望道同志和夫人蔡葵副教授(摄于一九五三年)



陈望道同志和
夏征农、杨西光同志
(摄于一九六五年)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九三五年九月陈望道同志在上海主编的
《太白》半月刊封面



编辑说明

一、陈望道同志是我国文化学术界一位卓越的战士。编辑出版《陈望道文集》是为了纪念他的革命精神和学术业绩。

二、文集大体上是分类按年编排的。分卷如下：

第一卷 收集评论、杂感、文艺、书信等文章；

第二卷 收集《美学概论》、《因明学概略》、《作文法讲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等五种专著；

第三卷 收集关于语文学术的文章；

第四卷 收集关于翻译的著作和文章。

三、收入文集的文章，凡发表后作者生前修改过的，即照着修改；作者未曾修改过的，编集时也有一些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正，但不涉及内容。对于原有排印等方面的错误，也尽可能地作了校正。

四、文集的编辑工作是一九七八年冬开始的，时间比较仓促，文章收得还不完全；又加我们水平不高，编辑工作中疏漏讹错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惠予指正。

五、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胡愈之、夏征农、倪海曙等同志的殷切关怀和热情支持，又承胡愈之、夏征农同志为文集作序；上海市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新闻系等单位的同志热情提供资料，影印文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60114-2-08¹

的同志也为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向他们
表示深切的感谢！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

序 言

胡 愈 之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在倪海曙同志等赞助下，费尽辛勤的劳动，搜集编纂成四卷本《陈望道文集》，为国庆三十周年献礼。这是对这位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的永久纪念，也为我国的革命文艺、语言科学、美学留下极其宝贵的财富。首先我要向文集的编者和读者表示衷心的庆幸。

陈望道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民主和科学艰苦奋斗的一生。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见证人和积极参加者。

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陈望道同志从日本回到了杭州，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为大本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北京、在长沙、在上海、在杭州以及其他大城市，涌现出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文化新军。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而陈望道同志则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和合作者。和鲁迅一样，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收集在文集第一卷里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批判文章、随感录和杂文，大部分是独具风格的

战斗檄文。在二十年代，他对纲常礼教，尊孔读经以及一切旧封建习惯势力，进行勇猛的冲击。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文化“围剿”的黑暗日子里，陈望道同志组织了一支反文化“围剿”的别动队，这就是大众语运动和他所主编的《太白》。大众语运动主要是为了抵制当时文言文复辟的逆流，也为后来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辟了道路。《太白》对于胡适、林语堂之流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给以有力的打击。正是在这一时期，陈望道同志和鲁迅在同一战线上起了冲锋陷阵的作用。在三十年代文化“围剿”和反“围剿”的搏斗中，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一败涂地”，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陈望道同志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陈望道同志早年就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洗礼，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我们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宣言》全文的最早译者。但是他从没有标榜自己是马列主义者，他始终是一个革命的实干家。他的言论和著作从未引用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片言只字，为自己的立场观点辩解。相反地他不断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直到最后一息。

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育工作的实践中，他深切体会到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就是正确地掌握表达思想的工具，对于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是极端重要的。五四时代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是成功的；但是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中国的语文科学体系。半文半白、不文不白的文字，仍然充斥于书籍报刊之上。陈望道同志在他的大半生中，辛勤劳动，刻苦钻研，呕心沥血，同语文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复古主义，崇外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从而初步建

立了现代中国语言科学的完整体系。收集在文集第二、三卷的著作和论文,既为现代语言科学填补了空白,也为今后的文字改革工作开辟了道路。包含他的美学、哲学、逻辑学以及文艺评论的著作在内,陈望道同志在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是不可磨灭的。

文集的出版,正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九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步前进。陈望道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语文科学,彻底地改革中国语文,改革语文教育,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是我们后死者不可旁贷的职责。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三日

忆望道老师

夏 征 农

陈望道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语言学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老战士。从“五四”运动到他逝世，他一直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行列，对发展我国新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第一个翻译者；“五四”时代主编过《新青年》；三十年代主编过《太白》。他直接参加了这一段时期内文化战线上的每一次论战，发表了许多有战斗性的文章，同时还翻译了几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文艺理论著作。他治学严谨，所著《修辞学发凡》，经不断修订，在我国堪称具有权威性的修辞学专著。《陈望道文集》不仅是望道同志一生战斗的记录，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有价值的史料。它的出版，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化史，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都是有用的。

我认识望道同志是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从南昌逃亡到上海。经同乡罗某介绍给望道同志，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望道同志是复旦中文系系主任，对于从武汉、广州、南昌等地来的青年学生，他都给予特别关注。我第一次见他时，他热情地询问我的经历。我请求他说，我曾经在南京金陵大学念过一年半书，希望能够插入复旦中文系二年级，证明文件以

后再补。他毫无难色地答应了。我进入复旦中文系后，我的第一个感触，就是同学们思想活跃，学习空气浓厚。办墙报蔚然成风，不仅对学校，对学习，而且对当时反动腐朽政治的不满，都能在墙报上反映出来。有不少同学参加了校外进步文艺团体，如创造社、太阳社、语丝社，并为这些团体办的刊物写稿。中文系还办了一个月刊，编辑由学生自己负责，经常发表一些同学写的有进步倾向的文章——小说、杂文。我的第一篇小说《罪与罚》，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在“革命文学”口号还刚刚问世，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继续在黄浦滩头翻滚的时候，这些活动，对于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确也起了一点微薄的作用。而这些活动，都是在望道同志或明或暗的支持下进行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大多是自由主义者，在当时也只能如此。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中文系二年级添了一门“应用社会学”，教师是陶希圣。他是《新生命月刊》的主编，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代言人。他第一课就是讲中国社会。他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并没有阶级之分，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当他讲完，同学们便一哄而上，把他围起来向他提出质问：“资本家有工厂，工人一无所有，只有出卖劳动力，这是不是两个阶级？地主有土地，农民无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这是不是两个阶级？怎么说没有阶级？”陶希圣哑口无言，怒气冲冲地挟起皮包跑了，从此辞职不干。不久望道同志又请国民党改组派的刘侃元来担任这一门课。他第一课也是讲中国社会。他承认中国存在阶级，但不认为有阶级斗争。他说，阶级关系是可以调和的。当他讲完后，同学们又是一哄而起，把他包围起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辩解了几句，便苦笑一下，也挟起皮包溜走

了,和陶希圣一样从此辞职不干。第二天,望道同志即找我们几个同学去谈话。他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这样搞,很不好,不但对学校不利,对你们自己也不利。”过一会又补上一句:“提问题是可以的,但不要起哄,以后……”他摇摇头没有说下去。他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既同情,又怕我们惹祸。我们不但没有因为受到批评而对他有什么不满,反而对他更感亲切。“应用社会学”这一门课,也就从此停开了。一九二九年九月,我因参加“飞行集会”被捕。那时,我是复旦共青团支部书记。望道同志得知后,不避风险,到处托人营救,并派同学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探望。仅以上几点,就可见望道同志对当时我们这些青年是如何关心和爱护。

望道同志与鲁迅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对鲁迅先生十分推崇。一九二七年秋冬之交,鲁迅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后,望道同志第一个请鲁迅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演讲。这可说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抗议。可惜的是不知为什么这篇讲稿没有编入《鲁迅全集》。一九三二年我作为一个新兵登上上海文坛时,望道同志为了介绍我同鲁迅认识,特意请鲁迅同我一道吃了一次便饭。他们两人那种亲密无间、谈笑自若的交谈,以及对我的恳切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未能忘怀。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围剿正日益加紧,鲁迅著作已被禁止出售,望道同志恰于此时与施存统合办“大江书店”出版了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一九三四年,望道同志主编《太白》,几乎每期都有鲁迅的文章,其中“掂斤簸两”一栏,大部分是鲁迅写的。《太白》成了当时文化战线上一支别具风格的尖兵。据我所知,望道同志当时没有参加任何左翼组织,但是,他始终不动声色地站在鲁迅

同一条战壕里，同鲁迅一样与我们党同呼吸共命运。特别难得的是，正在国民党对革命文化进行围剿的严重关头，他敢于站出来，组织新军，用迂回战术配合作战，以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望道同志对革命文化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

望道同志对我个人来说，是同志，又是良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他同样遭到迫害。他卧病，我没有自由到医院看望；他逝世，我没有自由到灵前一表哀悼微忱。现在，林彪、“四人帮”已永远被埋葬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而我们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事业则将日益发展，永世长留。值此《陈望道文集》出版之际，凭记忆所及，掇拾成篇，以志不忘。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陈望道同志传略

陈望道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名参一、融，浙江义乌人，生于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九日。

陈望道同志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里，他六岁入学，一直到十六岁前，就读于故乡义乌分水塘村的私塾，并在课余参加农业劳动。一九〇六年，他十六岁，进义乌县立绣湖小学学习博物与算术；十七岁随长者在乡办学，当教员；十八岁考进金华中学，在校学习四年，成绩优良；继而在上海某补习学校、浙江之江大学学习。一九一五年一月赴日本留学，前后四年，在东洋大学修习文学、哲学，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修习法律，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得到法学士学位。与此同时，他又进物理专科学校的夜校学习数学、物理等科目。留学期间，陈望道同志于课外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对于他后来从事革命宣传和以进步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有直接的和重大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陈望道同志也就在这一年五月从日本归国。六月应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聘请，任该校语文课教员。这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已冲击到浙江，他立即投身于这个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他在浙一师和一些进步师生的革命行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迫害，被加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